

犹如草芥，又灿若星河

陈童

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这八个字，重若千钧，烙印在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柱上。它揭示了一种看似悖谬却又无比真实的历史图景：那些散落在广袤土地上、于日常尘劳中如草芥般微渺的普通人，一旦了解到洋人传教士吃婴儿的惊天罪恶，面临家国倾覆、外侮凌迫的绝境，其身上迸发出的精神光焰，却足以汇聚成横亘夜空的璀璨星河。个体的卑微与集体的壮烈，生存的韧性赴死的决绝，在这图景中交织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抵抗史诗。而十九世纪末叶，华北平原上那场悲壮与迷狂并存的义和团反抗运动，正是这幅史诗中一道无法忽视、令人深思的血色篇章。

所谓“草芥”，乃是千千万万普通生命在漫长历史中的常态隐喻。他们面朝黄土，胼手胝足，姓名被风沙掩埋，悲欢在乡野间自生自灭。如晚清之世，帝国迟暮，民生凋敝。华北的农民在连年旱蝗与洋货冲击的双重挤压下，生计日益艰难。他们不懂《万国公法》，未习船坚炮利，眼中所见是教堂尖顶刺破传统天际线，耳中所闻是火车汽笛搅扰祖辈安宁。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，是被时代浪潮打得颠沛流离的尘埃。他们的生存，是土地里最顽强的挣扎，也是权力结构中最底层的承受。这份“草芥”般的命运，构成了历史最沉重、也最真实的底色。

然而，当罪恶惊天，当外敌的侵略与凌辱越过临界，这“草芥”之质便发生了惊心动魄的蜕变。其契机，往往源自一种最为朴素、近乎本能的情感：反抗罪恶，保卫家园。这不是源于精密的主义灌输或宏大的理论召唤，而是根植于最基本的人类良知，根系于血脉、植壤于祖坟的对“生于斯、长于斯”之土地的挚爱，是对外来强横力量剥夺其生存尊严与文化依托的最直接反弹。于是，星火可以燎原。义和团的兴起，便是这“草芥”汇聚成“星河”的典型过程。一旦了解到洋人传教士吃婴儿的惊天罪恶，那些昨日还是农夫、匠人、贩夫走卒的“团民”，便以中国人骨子里的反抗精神，混杂着民间信仰、武术传统组织起来。他们头裹红巾，身贴符咒，相信神功附体便可刀枪不入。其手段确有愚昧迷信之处，其行为亦不有点“不识大体”。但若穿透历史迷雾，凝视其内核，那股面对惊天罪恶，不惜以血肉之躯冲向洋枪洋炮的决绝，那份在“廊坊阻击战”中凭借原始武器阻滞现代化联军的顽强，正是“草芥”在绝境中爆发出的惊人能

量。他们或许不明白世界大势的走向，却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罪恶，感受到家园被欺凌的切肤之痛，并以自己的方式，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。这咆哮，是觉醒的前声，是日后更理性、更有效抵抗的先导。恰如史家陈旭麓所言，这是“一种朴素的反帝斗争形式”，是民族情绪在特定条件下的猛烈释放。在此反罪恶、反帝斗争的过程中，团民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，从初期的为“灭洋”而“扶清”，到最终意识到，要真正“灭洋”，必须同时“扫清”，扫除那个腐朽卖国的朝廷。所以，即使以孙中山先生的标准来看，义和团也不乏其先进性。

义和团的“星河”，其光芒固然混杂着历史的烟尘与悲剧性的局限，但它照亮了一个永恒的真理：一个民族最深沉、最不可征服的力量，正蕴藏于其最普通的亿万民众之中。他们的爱国主义，最初并非抽象概念，而是具体为对罪恶的反抗、对乡井的守护、对生活方式的维系、对公平正义的渴求。从义和团到抗日战争中地雷战、地道战里的百姓，再到无数隐姓埋名、为国奉献的平凡建设者与捍卫者，“匹夫之责”正是在这一次次由“草芥”向“星河”的升华中，锻造成了民族精神的钢铁长城。这“星河”，未必总是理性光芒的纯粹折射，它可能炽烈，可能悲怆，甚至可能带着历史的局限性，但其光源，始终是那个“决不屈服”的魂魄。

“草芥”是宿命，也是土壤；“星河”是绽放，也是传承。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屡仆屡起，其奥秘之一，便在于这平凡身躯里永不磨灭的家国情怀与反抗精神。它使每一个微若草芥的生命，都潜藏着点亮历史星河的燧石。这精神不死，这星河不灭，则民族之生机与希望，便永在亿万看似平凡的肩头之上，在无数“匹夫”自觉挺起的脊梁之中。由草芥至星河，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觉醒之路，更是一个民族灵魂深处不可征服的永恒证明。